

7-2016

明代 "古詩" 總集的編纂、出版、接受：從宏觀角度的考察

Jing CHEN

美國伊利諾伊大學香檳分校

Follow this and additional works at: https://commons.ln.edu.hk/ljcs_new



Part of the [Chinese Studies Commons](#)

參考書目格式 Recommended Citation

陳婧 (2016)。明代 "古詩" 總集的編纂、出版、接受：從宏觀角度的考察。《嶺南學報》，復刊 第六輯，頁 105-133。檢自 https://commons.ln.edu.hk/ljcs_new/vol6/iss1/6

This 明清詩學、詞學及文化 Poetry and Culture of the Ming-Qing Period is brought to you for free and open access by the Department of Chinese at Digital Commons @ Lingnan University. It has been accepted for inclusion in 嶺南學報 Lingnan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by an authorized editor of Digital Commons @ Lingnan University.

明代“古詩”總集的編纂、出版、接受

——從宏觀角度的考察

陳 婧

【摘 要】近年來，明清時期“古詩”總集的編撰與出版逐漸得到學界注意。多數研究以出版業的興起為時代背景，檢析一部或幾部重要選本的內容及其所體現的文學觀點。這些考證及研究則為本文的分析提供了可能與基礎。本文嘗試另闢蹊徑，以副文本(paratext)的閱讀為中心，兼及文本，從宏觀層面勾勒有明一代“古詩”總集的編撰與出版，以及這類書籍可能的流通與接受之宏觀趨勢。第一部分以筆者檢索書目所累計的條目為基礎，對先唐詩文集在明代的編纂出版進行量化分析，從而進一步確認明代是先唐詩文集產生的高峰；隨後三個部分各以不同的副文本(paratext)要素為討論中心：首先，以書名為中心，對書名加以分組語義詞頻考察，探尋先唐詩類總集的命名策略與所呈現的編纂趨勢；其次，以序言為中心，管窺總集編纂動機的變化；然後，以書目為中心，討論明代這類書的價格、目標讀者、閱讀體驗等。最後，本文將明代古詩總集的產生與發展分為三個階段，進而總結出明代古詩總集的編纂、出版、流通在不同時期的特點。

【關鍵詞】古詩 總集 先唐 出版 副文本 明代

近年來，隨著文獻資料的逐漸充裕，明清時期“古詩”總集的編撰與出版逐漸得到學界注意。多數研究以出版業的興起為時代背景，檢析一部或幾部重要選本的內容及其所體現的文學觀點。這些考證及研究則為本文

的分析提供了基礎。本文嘗試另闢蹊徑,以副文本(paratext)的閱讀為中心,兼及文本,試圖從宏觀層面勾勒有明一代古體詩總集的編撰、出版以及(可能的)流通、接受,並探尋在詩歌選集的編纂出版過程中,編者、作序者、出版方等諸方勢力如何從各自不同的角度賦予或改變總集作為書本的意義,引導了後世讀者的閱讀體驗。本文將以筆者檢索書目所累計的條目為基礎,兼引前人研究成果,量化分析,並閱讀三種不同的副文本要素,勾勒出這類總集的出版、編撰、接受之宏觀趨勢。首先,通過對先唐文學總集的量化分析,通過與明代之前情況的比較,本文從書籍的總量、年產出平均值兩方面進一步證實“先唐詩文的編纂在明代達到高潮”這一結論。隨後,本文將關注中心轉向先唐詩文總集的詩類總集,按照目前可見的材料分析這些書籍的書名、序言,以及記載這些總集的書目:首先本文按照書名中不同的語義要素加以分組,進而對詞頻加以考察,從而探尋先唐詩類總集的纂修趨勢;然後筆者以目力所及的序言為例,從不同時代的序言管窺編纂動機的變化;隨後筆者以書目為中心,從而推知在明代這類書的價格與目標讀者。最後,本文對明代古詩總集的編纂、出版、流通、閱讀進行了總結,將明代古詩總集的產生與發展分為三個階段,並反思了宏觀研究模式的優點與不足。

一、總集研究的三種面向

“總集”一名,與英文“anthology”為對應術語,在傳統目錄學上與別集相對,其特徵體現為:所集作品出自多位不同作者之手。阮孝緒始用此名,後為《隋書·經籍志》襲之。《隋書·經籍志》以為總集始於摯虞《文章流別集》^①,同理,四庫館臣稱“《三百篇》既列為經,王逸所哀又僅《楚辭》一家,故體例所成,以摯虞《流別》為始。其書雖佚,其論尚散見《藝文類聚》中,蓋分體編錄者也”^②。據《隋書·經籍志》“總集”目錄所載,隋初總集已達二百餘部^③,雖然《隋書·經籍志》所列書籍多已散佚或有重複,然由此仍

① 《隋書》志第三十經籍四,《隋書》第四冊(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版),第1089頁。

②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版),第2598頁。

③ 《隋書·經籍志》稱“通計亡書,合二百四十九部”,見《隋書》志第三十經籍四,《隋書》第四冊(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版),第1089頁。

可見手抄本文化時代，文學總集的編纂已蔚為風氣。

總集之重要性不言自明，四庫館臣贊之為“是固文章之衡鑒，著作之淵藪矣”^①。作為文學作品的載體，文學總集記錄保存了衆多作家作品，而且，可以說，中國文學史便是由多部總集構建而成。《詩經》、《楚辭》乃是最早的總集，摯虞《文章流別集》以後，單就純文學總集而言，詩總集、文總集、詩文合選總集等在各朝各代均層出不窮，保存了大量文獻及文學作品。

就材料論，總集分類多樣。有通代、斷代之分，又有地域總集、家集之分，又有詩集、文集、詩文總集、詞總集之分，或又有當代人選當代詩文、當代人選前代詩文之分。四庫館臣將總集分為兩類：“一則網羅放佚，使零章殘什，並有所歸；一則刪汰繁蕪，使莠稗咸除，菁華畢出。”^②這兩類的區別在於編纂原則的不同：前者求全，後者求精。前者或可稱為以總彙為目的，後者或可認為是現今所說的“選本”或“選集”。因此，總集研究實則應當涵蓋“選本研究”與“總彙類總集研究”二類。

最近十年來，文學總集研究漸漸成為中文學界古代文學文獻研究的熱門話題。若在中國知網(CNKI)上以“總集”為主題或關鍵詞搜索人文社科類論文，可見2006年之後，涉及總集，以總集為主題詞的研究成果在數量上呈爆發增長，並持續在後繼八年(2006—2014)中保持穩定上升的態勢^③。這些研究大多從各個角度對文學總集及其編纂出版都進行了深入而頗有見地的分析。相較而言，海外漢學界對文學總集的研究在數量上無法與中文學界的成果抗衡，研究成果亦似乎並沒有在最近十年內出現顯著增長。目前所見西方漢學界對中國文學總集的研究多集中在20世紀90年代末與本世紀初，然而，與中文學界的研究相比，海外漢學界的同類研究多以理論為綱，以文獻材料為目，為總集研究帶來了如文類理論、經典化理論等諸多

①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版)，第2598頁。

② 同上。

③ 筆者的檢索涵蓋“中國期刊全文數據庫”、“中國博士論文全文數據庫”、“中國優秀碩士學位論文全文數據庫”、“中國重要會議論文全文數據庫”，2006年之前每年研究成果增長態勢較緩，數量上一直為100以下，2006年的研究成果陡增，已破100，隨後每年均呈現顯著增長。又以“總集”為關鍵詞在cnki學術趨勢網站(<http://trend.cnki.net/TrendSearch/>)進行檢索，可得出類似結論。不過筆者尚未對港臺地區學術研究進行檢索，未知是否有同樣的增長趨勢。然以印象所見，似乎港臺地區最近幾年亦出現不少研究選本或總集的碩博論文。

理論面向,頗具啓發意義^①。

細檢研究成果,可見目前中西學界對總集的研究可分為兩個面向。一是文獻學面向。這類研究對各類總集加以文獻整理與版本考索。如對唐人選唐詩的點校整理,又如對某些明清知名選家所撰的明清古詩選集的整理出版^②。並進而討論某些重要總集的編纂、版本流變等。作為文學作品載體的總集,其本身的編纂進程、編纂原則往往是研究的焦點。如對《文選》的成書過程、編選原則等研究可謂是中古文學研究中的顯學^③。在明清領域體現為著眼於一部重要總集,對某部集子加以考察^④。這類研究關注書籍本身,材料上似乎往往集中於考察一部或幾部較為出名的總集,從而考察舊材料,同時發現新材料,這類研究對總集版本流變的考察往往有助於學界對書籍出版流通的理解。二是文學批評面向。這類研究將選本與文學批評聯繫,考察集中所體現的編者之文學批評觀。因選本批評被認為

① 相關研究見海陶璋對《文選》與文類理論關係的考察,見 James R. Hightower, "The Wen Hsian and Genre Theory",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Vol. 20, No. 3/4 (Dec., 1957): 512 - 533; 又見余寶琳對選集與經典化關係的考察,見 Pauline Yu, "Poems in Their Place: Collections and Canons in Early Chinese Literature",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50, no. 1 (June 1990): 163 - 196; "The Chinese Poetic Canon and Its Boundaries", in *Boundaries in China*, ed. John Hay (London: Reaktion Books, 1994), pp. 105 - 123; "Canon Formations in Late Imperial China," in *Culture and State in Chinese History: Conventions, Accommodations, and Critiques*, eds., Theodore Huters, R. Bin Wong, and Pauline Yu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pp. 83 - 104; "Charting the Landscape of Chinese Poetry", *Chinese Literature: Essays, Articles, Reviews (CLEAR)* 20 (December 1998): 71 - 87. 又可見孫康宜與方秀潔對明清兩代女性總集與經典化關係的考察,見 Kang-I Sun Chang, "Ming and Qing Anthologies of Women's Poetry and Their Selection Strategies", in *Writing Women in Late Imperial China*, ed. Ellen Widmer and Chang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pp. 147 - 170; Grace S. Fong, "Gender and the Failure of Canonization: Anthologizing Women's Poetry in the Late Ming", *Chinese Literature: Essays, Articles, Reviews (CLEAR)* 26 (December 2004): 129 - 149; Grace S. Fong, *Herself an Author: Gender, Agency, and Writing in Late Imperial China*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8), pp. 129 - 158.

② 相關研究如陳尚君:《唐人編選詩歌總集敘錄》,載於《唐代文學叢考》(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年版),第184—222頁;又如傅璇琮、陳尚君、徐俊:《唐人選唐詩新編(增訂本)》(北京:中華書局,2014年版)。最近幾年明清古詩總集整理出版的相關成果如[明]張之象:《古詩類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清]陳祚明評點、李金松點校:《采菽堂古詩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等等。

③ 相關研究如傅剛:《昭明文選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年版);傅剛:《文選版本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王立群:《文選成書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2005年版)。

④ 在明清古詩總集研究上,相當多的期刊文章及學位論文討論李攀龍《古今詩刪》、鍾惺《古詩歸》、沈德潛《古詩源》、王士禛《古詩選》等一些知名選集。不一而足。

是中國文學批評中一類獨特的批評方式^①，研究者從而可對不同編者所編選的不同本子加以分析比較，得見不同批評家、不同文學流派的觀點等；研究者又或常以一部書籍所選的條目入手，考量文學接受史或文學批評史：比如，他們會計量比較分析同一總集中不同作家或作品選入的比例，由此推見編者對不同作家、不同作品、不同時代的褒貶；又如，研究者也往往在歷史維度上，對不同總集中，同一作家或作品的數量進行排列分析，進而推知某一作家或作品在不同時代的地位浮沉，了解作家作品的文學接受史。這類研究中不少成果也受到了西方經典化理論的影響，從而將總集作為經典化的工具加以考察，如此種種，不一而足^②。不過，這類研究理路背後實則隱含有一既定前提，即，認為一部總集的選目往往體現了編者對作品的價值判斷及態度。以材料論，這類研究分析的對象往往是求精的選本，往往並不看重求全的總集。

若在比較的維度上考慮西方學界對歐洲文學總集，即對 anthology 的研究，似乎可發現值得借鑒的另一種角度，或可稱為另一種面向：總集社會學面向。他們對歐洲 17、18 世紀總集的討論會涉及文學接受、文學傳統的構建、經典化等議題，同時他們也致力於討論總集對當時社會風氣建構的貢獻，他們的研究結論包括：總集有助於建構現代社會集體認同，總集調和了社會各個階層的閱讀品位，催生了現代讀者，總集的編纂反證了當時興起的“小說”在讀者群上的局限性，當代總集的編纂在極大程度上是以教學需要為導向等等^③。這類研究雖然均由英語文學系學者操作，然本質上已然跳脫純粹的文學研究範圍，而是受到書籍史、印刷史、閱讀史等理論維度的影響，材料上也並無求全或求精的總集之偏，雖然這是因為 17、18 世紀時，西方文學總集往往為書商所輯，並不能體現個體或流派的文學批

① 張伯偉：《中國古代文學批評方法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02 年版），第 277—326 頁。

② 關於選本、選集的專著與期刊論文多討論選集與文學批評的關係。考察宋代詩選的著作可參卞東波：《南宋詩選與宋代詩學考論》（北京：中華書局，2009 年版）；而除了詩體以外，對詞體總集的研究亦可參蕭鵬：《群體的選擇——唐宋人選詞與詞選通論》（臺北：文津出版社，1992 年版）；閔豐：《清初清詞選本考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年版）。

③ 主要研究參 Barbara M. Benedict, *Making the Modern Reader: Cultural Mediation in Early Modern Literary Anthologies*,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6; Leah Price, *The Anthology and the Rise of the Novel: From Richardson to George Elio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Anne Ferry, *Tradition and the Individual Poem: An Inquiry into Anthologies*.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Jeffrey R. Di Leo ed., *On Anthologies: Politics and Pedagogy*. Lincol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2004.

評觀點^①,不過在研究方法、理論、結論上均可值得參考借鑒。這類研究應屬於“文學社會學”(sociology of literature)範疇,即考察的並非文學本身,而是文本的發生、流通、消費等,在總集的個案上則可稱為是“總集社會學”,體現為考察書籍的誕生、流通、消費、閱讀。而就本文的研究而言,在印刷業日漸繁盛、商業出版興起的明清社會環境下研究文學總集,這類思路則恰好可用,有重要的借鑒意義^②。

因此,對文學總集的研究可總結為文獻學面向、文學批評面向、總集社會學面向三種。而在明清“古詩”總集的研究中,雖會涉及某些書籍的纂修過程,然而主要研究思路仍往往是前兩者。和對總集研究的關注度日漸升溫一樣,最近幾年來,明清時期“古詩”總集的編撰與出版也漸為學界關注。所謂“古詩總集”,形式上應指以古體寫作的詩之總集;不過由於“古詩”一詞在時代指向上的模糊,“古詩總集”往往在實際討論中包括兩種——唐代以前的詩體總集和純以各代古體詩為選目的詩總集,前者例證可見沈德潛《古詩源》,後者例證可見王士禛《古詩選》。討論中,學者以“漢魏六朝詩歌總集”和較為模糊的“古詩總集”稱呼這兩類材料^③。由於明清時期這類總集繁多,因此目前易於操作的方法往往是:開篇首章概論這種總集的歷史、概述時代背景,列出文獻材料,而後各章以一部或幾部重要總集為中心,討論每部書籍的編纂過程、內容、版本流變等^④。這類研究雖然輯入不少文獻材料,而在分析上往往是個案研究,討論的重點則是一部或幾部重

① 西方與中國文學選本的比較在張伯偉教授的書中略有提及,可參張伯偉:《中國古代文學批評方法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02年版),第278頁。

② 明清史學的研究中有時也會觸及總集研究,材料上一般不會局限於文學總集,亦多採用書籍史印刷史等理論角度。他們或認為清初編纂的地方總集體現了某一地域的社會認同之加強,又或認為晚明時,編纂“四書”一類的經學評點總集是對正統思想的挑戰。參見Tobie Meyer-Fong, “Chapter 3 Anthologies, Monuments, and the Invented Past: The Tower of Literary Selection”, in *Building Culture in Early Qing Yangzhou*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pp. 75 - 127; 與 Kai-wing Chow, “Chapter 4 Paratext: Commentaries, Ideology, and Politics”, in *Publishing, Culture and Power in Early Modern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pp. 149 - 188.

③ 前者如楊焄2009年出版的《明人編選漢魏六朝詩歌總集研究》,研究對象為“漢魏六朝詩歌總集”,後者如景獻力2005年福建師範大學博士論文《明清古詩選本個案研究》,以“古詩選本”為研究對象,材料上與楊焄多有重合。

④ 這種章節安排和研究方法可見景獻力:《明清古詩選本個案研究》(福建師範大學博士論文,2005年);解國旺《明代古詩選本研究》(河南大學博士論文,2007年);楊焄《明人編選漢魏六朝詩歌總集研究》(西安:陝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

要選本的內容、版本、編者文學觀等等，較少涉及書籍流通、消費、閱讀等方面^①。不過，他們對明清這類總集的文獻考索、版本考證、內容分析卻為宏觀分析提供了豐富的文獻學基礎，使得筆者對宏觀趨勢的分析成為可能。

二、本文的研究方法、研究材料、研究思路

因此，本文希冀借鑒前人對單部總集的研究，採取宏觀角度，勾勒出明清“古詩”總集編纂、出版、閱讀在宏觀上的“變”與“不變”。如果說，將各部總集看作各色珠玉，那麼前人的這些研究則是對每顆珠玉內部的結構加以分析，而本文則試圖將這些珠玉串成一串，考察其間“串綫”的特質。

在分析方法上，本文以對副文本（paratext）的考察為中心。副文本（paratext）一詞為法國結構主義批評家熱奈特所提出，中文譯法多樣，可譯為“類文本”、“副文本”、“超副文本”等等，為行文方便，本文仍採目前較為通用的中文譯法“副文本”來展開討論。所謂“副文本”，包括兩種：一是書籍內部除了文本以外的其他各類材料，如總集的標題、序言、目錄、作品的點評、文本的視覺排版等，這類被稱為“內部副文本（peritext）”；二是書籍實體之外的要素，如出版商的出版策略、廣告策略、作者與出版商對書籍的討論或評價等，這類是“外部副文本（epitext）”，並非書籍實體內部存在的要素，但卻是與書籍的流通接受有關的、至為重要的相關要素。這二者合稱“副文本（paratext）”，是詮釋之門檻（thresholds of interpretation），決定了書籍與文本的閱讀、接受^②。由於“副文本”這一概念本身產生於書籍史的研究，因此借用這一西方術語對明代的總集出版加以討論，非但不是概念混用，而是恰恰可以揭示出書籍在生產流通中的一系列現象與

① 楊焄 2009 年出版的《明人編選漢魏六朝詩歌總集研究》第一章涉及了一些書籍的出版問題，討論了漢魏六朝詩歌總集的動因與刊行情況，有不少發現。見楊焄：《明人編選漢魏六朝詩歌總集研究》，第 10—33 頁。

② 對這些主要概念的釐清與討論參見 Gérard Genette, *Paratexts: Thresholds of Interpretation*, trans. Jane E. Lewi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趨勢^①。

本文的討論涉及總集的三種副文本要素：標題、序言、書目，前二者應算是內部副文本(peritext)，而後一種應算是外部副文本(epitext)。從標題，可勾勒總集編纂的大致趨勢，亦可管窺命名策略之“變”；從序言，可細查編者編纂動機之“雜”或“純”；從序言與書目，可管窺出版流通之“難”或“易”；從序言與書目，也可推斷古詩總集的流通社群，和讀者的可能閱讀體驗。另外，由於參與一部總集命名、序言撰寫的人士有編者、有出版者，也有受邀作序的當時名人，因此，所有文本背後隱藏的作者預設立場也是本文需要關注的重點。同時，西方書籍史研究認為書籍的形式(form)決定了書的傳播、接受，並且認為每部書籍都有自身存在的價值與意義，每部書籍都體現了出版過程中各方勢力的角鬭、制衡、調和等^②。按照這一理念，本文也希冀考察在詩歌選集的編纂、出版、接受過程中，編者、作序者、出版方等諸方勢力如何從各自不同的角度賦予或改變總集作為書本的意義，進而引導當時以及後世讀者的閱讀體驗。

當然，這裏的結論無疑也會受到文獻材料的限制，雖在文獻材料蒐集上，本文亦思求全，然而畢竟無法做到真正完全涉及所有當時材料，只能是從目力所及的材料入手，勾勒大概面貌。因宏觀考察的需要，材料上包括求全與求精的兩類總集。不過，如上所述，前人研究時所涉及的材料不僅包括漢魏六朝詩歌總集，也包括各代古體詩選集。這因此使得本文的研究對象變得模糊不清。

那麼，什麼是“古詩總集”？這一術語的定義之困難一是源於“古詩”本身定義的模糊，目前公認的“古詩”時代上指先唐詩，然而文體上指的是“古體詩”，這種情況，在筆者看來，與明代人編纂總集時的命名策略大有關係。“古體”一詞本產於唐代，與“近體”相對，先唐詩雖然說在文體上可統稱為“古體詩”，然而在目前研究者心目中也往往被稱為“古詩”，“古詩”一詞本

① 以“副文本”概念討論明清總集出版的研究成果可見陳水雲：《唐宋詞集“副文本”及其傳播指向——以明末清初編刻的唐宋詞集為討論中心》，載於《江西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43卷第4期（2010年8月），第46—53頁；以此概念討論女性詩集出版的研究可見 Grace Fong, “The Life and Afterlife of Ling Zhiyuan (1831–1852) and Her Poetry Collection”, *Journal of Chinese Literature and Culture* 1.1–2 (November 2014), pp. 125–154.

② 具體研究參見 Roger Chartier, *The Order of Books: Readers, Authors, and Libraries in Europe Between the 14th and the 18th Centuries*.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指過去的詩,然實際情況中,按照下文對總集書名的考略,可以看到,中明到晚明時,編纂先唐詩體總集漸成風氣,晚明出版的先唐詩總集書名中多直接以“古詩”泛指“先唐詩”了。因此,這一現象的存在使得現存的研究往往處於定義不明,或是定義兩難的境地。爲了解決研究對象定義不明的問題,本文下一部分便以“先唐詩文總集”爲中心,希望先探尋並釐清這類書籍出版編纂的歷史趨勢,隨後方轉向對其間先唐詩類總集的討論。

材料收集上,如上所述,前人研究所輯得的文獻無疑爲本文的分析提供了文獻基礎^①,同時,在他們所列出的材料基礎上,筆者查考《中國古籍善本書目》、《中國古籍總目》、《四庫》系列書目、明清時人的書目,力求收集盡可能多的總集,使得宏觀面貌盡可能可靠。筆者查考的明清書目主要包括中華書局《宋元明清書目題跋叢刊》、商務印書館《中國著名藏書家書目彙刊·明清卷》,而這兩套叢書中的書目大致可分爲藏書目錄與刻書目錄兩類,前者又可下分爲官藏、私藏二類;後者可分官刻、私刻、坊刻三類,因此本文所查考的明清時人書目的分佈情況如下表:

表一：明清藏書、刻書目錄的數量分佈

		明	清
藏書目	官藏書目	5	2
	私藏書目	20	61
	經籍志類	5	0
	日本書目	0	3
刻書目	官刻書目	3	0
	坊刻書目	3	0
	私刻書目	1	0

① 景獻力《明清古詩選本個案研究》列出 19 部明代古詩總集與 51 部清代古詩總集,見其福建師範大學博士論文,2005 年,第 24—25 頁;而解國旺《明代古詩選本研究》輯得 152 種明代古詩總集,並分爲通代、斷代、詩人合選、僧詩選本、女性詩選、地區詩選、待考七類,見其河南大學博士論文,2007 年,第 33—83 頁;楊焄《明人編選漢魏六朝詩歌總集研究》則一共分析了 16 部明代古詩總集。

由於篇目及時間限制,這裏以明代產生的總集的情況為例加以考察^①,根據筆者所整合的數據,清代亦產生了諸多同類型的古詩總集,然而,若以類似的分析方法與角度運用於清代類似總集的分析,結論則會不盡相同^②。

三、先唐詩文總集、詩體總集編纂 趨勢的量化分析

與前代相比,有明一代,先唐文學總集的纂修與出版達到了高峰,或者說先唐文學總集的纂修出版在明代異軍突起,就數量而言,這類總集比前代顯著增加。當前研究均會論及“古詩”總集在明代的增長,稱“明代開始,古詩選本較前有大幅度的增長”^③,實際上說的也就是先唐詩總集的增長。但這些研究往往是印象式的概括式的,例證多是那些純選古詩的集子。因此本文擬從收集到的先唐詩文總集入手,探尋是否可得出類似的結論,或是否可進一步充實或修正當前的結論。

若要證明有明一代,在編纂總集時,對這一類選集的關注驟增,便需要考察同類總集在明以前各個朝代是否是編纂的重點。筆者通過檢視唐宋經籍志與藝文志、宋代幾部官藏與私藏書目、元代可見書目的“總集”部分、今人考證成果等^④,得出以下結論:首先,從摯虞始,迄於隋末的這一階段,為唐代以前,這一時段的總集應歸入當代人集當代作品一類,然而由於此時總集多佚,書目記載往往重出,因此在參照前人對各部總集的考證成果以後,若不算應用文一類的表、戒等文體,純選詩的總集大約為 40 種,樂府

① 本文分析不涉及專選一地詩文的地域總集或家集。

② 對這一點筆者會在未來另文敘述。

③ 景獻力:《明清古詩選本個案研究》,第 24 頁。

④ 筆者所查原始材料有《隋書·經籍志》、《舊唐書·經籍志》、《新唐書·藝文志》、《宋史·藝文志》、《二十五史補編》、《補元史藝文志》、《崇文總目》、《崇文總目輯釋補正》、《秘書省續編到四庫闕書目》二卷、《中興館閣書目輯考》五卷、《遂初堂書目》一卷、《直齋書錄解題》三十二卷、《郡齋讀書志》四卷、《附志》一卷、《後志》二卷、《考異》一卷、元代《西湖書院重整書目》一卷、馬端臨纂《文獻通考·經籍考》七十六卷。今人考證成果有陳尚君:《唐人編選詩歌總集敘錄》,載於《唐代文學叢考》(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 年版),第 184—222 頁;孫琴安《唐詩選本六百種提要》(西安:陝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87 年版)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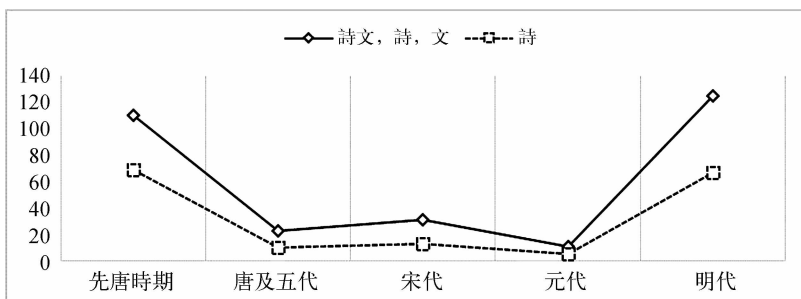
歌詩總集爲 29 種，詩文合選總集約有 41 種，因此，其中還有廣義上的“詩”的總集總計有 110 種。以時代論，由於這一時代的很多總集編者不明，產生朝代不明，很難將它們劃入特定朝代，不過大致來說，劉宋與梁代二代總集產生較多。第二，唐代迄五代的總集依然有纂者姓名缺失、書籍內容不明的情況，不過，能確定的是這一時段見證了唐人選唐詩的興起，而唐人所纂的先唐詩文總集相較而言較少，加以考證後，唐人所纂通代總集中有選先唐詩文的總集以及純選先唐的總集二種，加起來可確定的共有 23 部，純詩體總集僅有 10 部。到了宋代，古文總集編纂興起，此時“文”與“詩”的概念區分明顯，《文章正宗》、《古文關鍵》等古文總集較多，這些古文總集間或也雜選先唐古文，純選先唐詩體的總集則除了《樂府詩集》等，也不多。就數量而言，可大概確定爲通代總集中包括先唐詩文的總集以及純選先唐詩文的總集加起來共 31 部，其中純詩體總集大概共有 13 部。而就元代而言，雖然可能印書數量更多，然而能够查考的藏書目不多，確定包括先唐詩文的總集大概共 11 部，其中純選先唐詩體的共有 5 部，5 部中有 2 部則是劉履《選詩補注》、《選詩補遺》^①。需要說明的是，由於很多文獻的著者信息、書籍內容缺失，筆者只能盡可能參考各種書目及前人考證成果加以分類統計，這裏的數字是大略的，而並非確實的。儘管如此，這些數字卻也足以證明先唐詩文並不是唐、宋、元三朝總集編纂的焦點。

那麼明代的情況呢？可以確定的是，明代在先唐總集的纂修上的確出現大幅增長。明代不僅翻刻翻印前代書目頗多，新撰先唐總集也較多。這裏僅僅討論明人新撰先唐總集的情況，這類情況有二：其一是將前代已有的總集加以摘錄摘抄，或新彙新評，從而變爲新書出版；其二是將新發現的材料與舊材料混合，從而成爲新出或新撰總集。不過，筆者檢視明清書目時，常有書名一致而版本不一，或是不知是否一致，或書名不一而書籍相同的情況。如現在所說的《古詩紀》就常常被記爲《詩紀》，而其漢魏部分則被記爲《漢魏詩紀》，這是由於明代出版總集時有時並非一次性全部出版，刻書方或編者先取已經完成的部分出版，然後可能會順次遞取，最後也許會總彙成書，全集出版後，又會有書商從中摘取部分章節單獨成書出版，李攀龍《古今詩刪》的唐詩部分就曾受到書商青睞被割出單行。由於這種出版

^① 這兩部後與劉履選唐宋詩詞的《選詩續編》合稱爲《風雅翼》，對這三部內容的介紹，參見《四庫全書總目》卷一百八十八集部四十一總集類三，第 2637—2638 頁。

形式以及商業印書的介入,何爲原本?何爲新本?客觀來說,每一部書籍都有其存在的價值與意義,每一部書籍在讀者身上產生的接受效果也是與他者不同的,李攀龍《古今詩刪》與其中割出的《唐詩選》便成爲了兩本書,《唐詩選》單行本問世後流佈極廣,並直到今日也是日本接觸唐詩的重要途徑之一^①。因此可見,讀者對這兩本書產生的感知、閱讀體驗及接受都是不同的。

因此,若將這種內容不同,每次出版的新書(舊書重印不算)作爲新的1部計算,那麼從書名上保守推斷,排除地域總集與家集,可確定明人新撰,且內容確實選先唐詩、文的總集有110部,就純選詩體的總集論,有67部左右。不過晚明時期,叢編類的印刷出版似乎又頗爲流行^②,晚明人多將漢魏六朝名家詩文集以此形式刊行,根據《中國古籍總目》,叢編類的先唐文學總集有15部,由於這類集子往往是將詩文合選,因此若將這一類也算入明人纂先唐詩文的例子,那麼前者數字會變爲125,後者67部則不變。雖然以上統計得出的數字可能僅僅是約數而不是確實的數字,然而由這些數字,仍然可以見到從先唐至明編纂先唐文學總集的大略趨勢。圖一則對這些數字加以直觀呈現,實綫表示了從先唐到明,所出版的先唐詩文總集與詩總集及文總集在絕對總量上的變化;而虛綫則表示了各代所出版的純詩類先唐總集的數量變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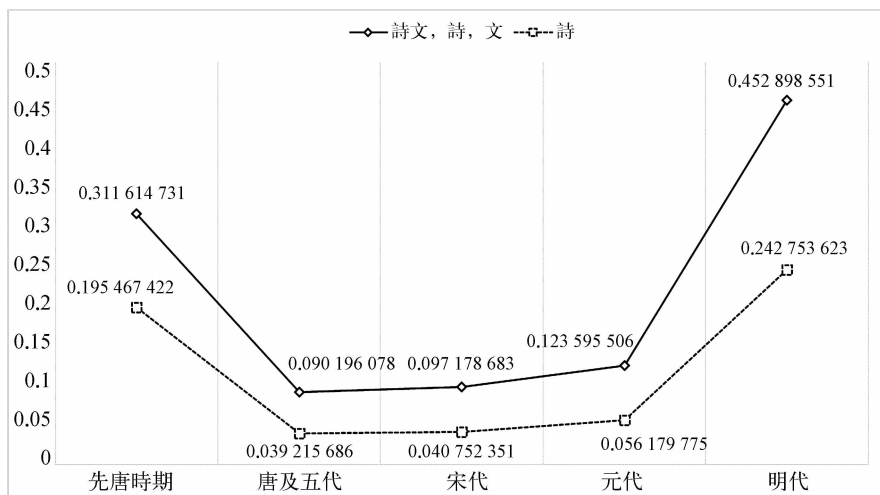
圖一：先唐詩、詩文、文總集在各代絕對數量的變化

① 見蔣寅：《舊題李攀龍〈唐詩選〉在日本的流傳和影響——日本接受中國文學的一個側面》，載於《國學研究》第12卷（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363—386頁。

② 對晚明時期叢書、類書出版的討論可參見 Benjamin Elman, “Collecting and Classifying: Ming Dynasty Compendia and Encyclopedias (Leishu)”, *Extrême Orient, Extrême Occident* (hors série 2007): 131—157; 中譯本見艾爾曼：《收集與分類：明代彙編與類書》，載於《學術月刊》2009年第5期，第126—138頁。

由圖一可以清楚看到,有明一代,先唐文學總集(包括詩文合選,純選詩,純選文三類)在絕對數量上超過了先唐時期、唐及五代、宋元二代,純選詩類的總集也在數目上遠超過唐及五代、宋、元等朝。

不過,絕對數量的上升並不意味明代出現了編纂這類書的高潮,畢竟一個朝代時間久遠,日積月累,產出書籍的數量自然會變多,那麼若以總數除以年數,每年這類書籍的平均產出數量又是如何^①?



圖二：五個時期平均每年產出先唐總集的數量

從圖一、圖二可見,無論是就絕對數量而言,還是就每年產出書籍的平均值而言,到明代突然陡增,斜綫趨勢變陡,不僅詩文總集如此,純選詩的總集也是這樣。同時,從圖二可發現按照這裏的保守估計,明代產出的先唐詩文總集的部數在絕對數量上比唐以前人選當時作品的總量還要多一些,在每年平均產值上也還要略勝一籌,前者約為0.31,後者約為0.45,那麼大概可推知明代兩年多就出一本先唐詩文總集。因此,在明代,不僅先唐詩文總集在絕對數量上比唐、宋、元陡增,每年平均產出值甚至超過西晉到隋末這一段先唐自己大量編纂當時總集的時期。基於總值與年平均值兩個參數,我們可以確認“比起前面幾個時代,有明一代,先唐詩文總集編纂達到高潮”這一結論。

① 先唐時期為西晉初年(265)到隋末,唐與五代時期為唐初到五代結束。

明代出產的先唐詩文總集按內容分,可分為以下三類:

表二:明代先唐詩文總集之類別

類 別	例 證	書 目
1. 先唐詩總集	馮惟訥《詩紀》	67
2. 純選先唐文總集	梅鼎祚《文紀》	38
3. 先唐詩文合選(及叢編類)	劉節《廣文選》 張溥《漢魏六朝一百三家集》	20

由於本文致力於討論“古詩”總集的纂修與出版趨勢,因此,在下文對總集的書目、序言等副文本要素的討論中,本文將主要側重上表的第1類與第3類。

不過,若要考察有明一代的書籍出版趨勢,則需要再加入歷史維度,看每一類書在什麼時期生產較多。如何將書目繫年?筆者試圖以初刻本出現年代繫年,若有的書再刻之時有書名變更,那也將其再刻年代記錄下來。根據作者生平、序言,或者書目所記錄的訊息可大概得見出版時段,不過,仍然有部分書無法繫以具體年份。就手頭資料所限,這裏先從書名入手,管窺編纂的特性與大致的變化趨勢。

四、從書名看編纂特性與趨勢

(一) 書名的語義詞頻分析

從語義角度,可將明清總集的書名分為三類元素:A指稱時代的語詞;B指稱文體及相關內容的語詞;C指稱書籍性質的語詞。如成於正德年間的一部古體詩選《漢魏詩選》的書名便可拆解列表如下:

表三:總集的書名三要素舉隅

A 時代指稱	B 文體及相關內容	C 對書籍性質的指稱
漢魏	詩	選

若是與實際書目加以參照,可發現:三類元素在書名中的順序不是固定的,可隨意調換;並非所有A、B、C三要素都需要出現在書名中;而且這三個要素前後均可插入其他要素:如“七十二家”這樣指稱作者數量的要素,又如

“五言”這類表示詩行長度的，有時也會有對出版商或點評人或品牌的指稱，如“名家”、“石倉”。因此，若是認為上表中的三個元素是必要元素，那麼其他這些元素可算是非必要元素。

另外，需要說明的是，在明代，書名往往是變動的，初版與新版書名不一致屬於極為常見的現象。如上文所述，明代出版事業的能動性與多樣性造就了這種情況，不過毋庸置疑的是，當時印刷興盛，書的數量增加，而每位出版者在新刻圖書的時候，應該都有新的考量。根據書籍史家羅杰·夏提埃（Roger Chartier）的觀點，每部書的每個新形式（form）都有意義，也就是說，每部書的每個新版本都賦予原書以新的意義^①。就本文所研究的材料而言，最明顯的例子即，在通代合選先唐與唐代的情況下，經常出現將先唐部分割裂出來另成一部的情況。因筆者數據均采自當時書籍目錄，書名不一的情況較多，這雖然一定程度上給本文的研究帶來了一些困難，然而另一方面反而使得本文對出版趨勢的研究也許更可直接反映或更為接近當時市場上書籍流通的現實狀況。

書名的三大要素中，A、B 兩類指稱總集所選的內容，而 C 類詞語指稱書名性質，流露出的是編者或出版者的意圖。考察 C 類字眼，可以將頻繁出現的字眼分為以下五類：C1 表示續纂的字眼，如“拾遺”、“補遺”等；C2 表示選擇的字眼，如“選”、“刪”等；C3 表示總括的字眼，如“集”、“彙”等；C4 表示類編的字眼，如“類選”、“類苑”等；C5 表示文學評釋的字眼，如“解”、“評”等。

這裏，筆者採取詞頻統計法，將 A、B、C 每類要素所用字眼的詞頻從高到低排列。需要說明的是，這裏的討論不涉及“文”的一類，所論及的材料僅僅是表二中 1、3 兩類總集。筆者將這兩類總集的書名合而論之，並將其詞頻最高的幾組字眼列出如下：

表四：與詩體相關的先唐總集之書名三要素常用字眼

	A 時代指稱	B 文體及相關內容	C 對書籍性質的指稱
先唐詩總集、先唐詩文合選兩類總集書名常用字眼	古(11次)、 六朝(8次)、 漢魏(6次)、 漢魏六朝(2次)	詩(41次)、 風雅(5次)、 樂府(2次)	C3 表示總括的字眼(36)； C1 表示續纂的字眼(19)； C2 表示選擇的字眼(9)

^① 主要觀點參見 Roger Chartier, *Forms and Meanings: Texts, Performances, and Audiences from Codex to Computer*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1995), pp. 6-24.

由表四可得出以下幾點：首先，“古”、“六朝”這類字眼在時代指稱中使用較多；其次，在文體上，除了習以為常的“詩”，“風雅”一詞用的也較多，這種用法在明人所編纂的其他類別的詩總集上也有例證，如明人選元詩便有《元風雅》一書；第三，在指稱總集特性的字眼上，令人吃驚的是，表示選擇的字眼（如“選”）在數量上不如表示總括（如“歸”、“紀”）以及表示續纂（如“補遺”）的字眼。

這些字眼之間有沒有歷史維度上的變化呢？雖然由於很多書的具體年份難考，然而根據當代人所編纂的古籍書目，輔助筆者所查檢的明清藏書家的藏書書目，大略可見：以時代論，“古”一字在書名中多出現在萬曆時期及之後；以文體論，“風雅”則多出現在萬曆以前的書名中；以書名指稱論，表示續纂的字眼多出現在萬曆之前，而表示總括的字眼多出現在萬曆或以後時期。

書名並不能代替全貌，參考前人的考證，發現可與對書名的宏觀考察所得出的結論互相參照，由此可總結出總集編纂的歷史變遷。根據當前數據，明代中期正德至嘉靖晚期，產生的先唐詩總集多是為《文選》、《玉臺新詠》補遺之作，或散見的幾部如《五言律祖》、《漢魏詩集》、《六朝聲偶》等著作，此時書名中多有明確的朝代指稱，書名中多有表示續纂的字眼，而嘉靖晚期開始至萬曆後期的詩體總集則多以“古詩”命名，並且多是大部頭的總括之作。四庫館臣曾認為“至明萬曆以後，儉黷漁利，坊刻彌增，剽竊陳因，動成巨帙”^①，然而，若是不對總集進行優劣上的文學價值判斷，那麼這些萬曆以後生產的書籍本身的存在其實也有其獨到意義的，這種意義更多的見於它們作為商業刻書而適應市場需求、適應讀者消費需求的能力。

（二）書名的變更、“古詩”總集的成立、印書者的參與

然而，僅僅得出這一結論也是不夠的。如上所示，由於副文本（paratext）決定了書籍的接受，因此，作為副文本（paratext）要素的“書名”不僅體現了命名者的意圖，而且還引導或定義後繼者編纂的方向與內容^②。比如，萬曆以及萬曆以後出於坊刻的詩集書名多將唐以前的詩集統稱“古

^①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百八十六集部三十九總集類一，第2598頁。

^② 關於書名的意義，參見“Titles,” in Gérard Genette, *Paratexts: Thresholds of Interpretation*, trans. Jane E. Lewi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pp. 55–103.

詩”，從而在總集命名上將“古詩”與“唐以前的詩”緊密聯繫在一起，這樣的做法則深刻影響了後繼編者對同類總集的編纂。

以“古詩”命名詩體總集的做法，明代不是首創，依筆者所見，宋代《遂初堂書目》便已經記有《古詩選》^①，由於其他評語的闕如，再加上這條記錄後面緊跟的條目就是《唐五言詩》，因此，我們也許可推測出“古詩選”在宋代刻書時，就已在書名上泛指唐以前的詩。元代黃景昌則有《古詩考錄》集漢魏至陳隋的詩，將不為樂家所採與樂家所採者集在一起^②，而到了明代，這種命名方式得以繼承，應該說，這種對先唐詩總集的命名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形塑了社會與時代對“古詩”的認知。

不過，將“古詩”在書名裏指稱先唐詩，也許並非是編纂者本人的原意。像馮惟訥所編的《詩紀》是嘉靖年間逐漸分卷編成，分卷刊行時以“風雅”或“漢魏”入書名，在嘉靖年間刊行時也並沒有以“古詩”蓋之，而是以《詩紀》為名。然而現在通行的四庫本以萬曆年間吳琯等重刊本為底本，四庫本所選入的張四維序言前面所列出的標題則變為《古詩紀原序》。不過若查驗對照現存的萬曆刊本，可見現存的吳琯等萬曆金陵重刊本也並沒有用“古詩紀”取代《詩紀》，張氏序言仍以《詩紀序》為題^③。難道直至清代，《古詩紀》才成為對《詩紀》一書的通稱？雖然明代的初刻本與重印本均沒有以《古詩紀》取代《詩紀》的原名，然而查驗藏書目錄，可見萬曆年間徐莒所撰的《紅雨樓書目》即載有馮惟訥所撰的“古詩紀”一條，由此可見萬曆年間，似乎坊間已有以《古詩紀》指代《詩紀》的情況了。

又如臧懋循萬曆三十一年所撰的《古詩所》，雖然現在通稱為《古詩所》，然而萬曆三十一年出版時，書名為《詩所》，不過三年後，在萬曆三十四年臧懋循刊行《唐詩所》時，則在序中徑稱之前的《詩所》為“古詩所”^④。由此可見，或許是為了區別先唐詩和唐詩總集，明人才會以“古詩”統稱先唐詩；而且，也可見，在萬曆時期，“古詩”用以指稱先唐詩總集這一用法或許

① 尤袤：《遂初堂書目》，《叢書集成初編》本（上海：商務印書館，1935年版），第33頁。

② 對此書及其文學觀點的分析可參見黃仁生《試論元末古樂府運動》（《文學評論》2002年第6期，第150頁）。

③ 參《詩紀》，萬曆吳琯等刻本，中國國家圖書館藏。

④ 分見《詩所》，《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325冊（濟南：齊魯書社，1997年版）；《唐詩所》，《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326冊。兩書的序見臧懋循：《詩所序》，第1—3頁；以及《唐詩所序》，第1—3頁。

已經深入人心了。

若是並非編撰者本人的原意,那麼或許是印書者爲了適應市場需要而更改書名。這樣的情況可見《古詩類苑》的例子。張之象所編的《古詩類苑》原與唐代部分合在一起,合稱爲“詩紀類林”,而在張之象身後,由他人所刻成的萬曆本中,爲了與前一年分開出版的《唐詩類苑》相對,書名成爲“古詩類苑”^①。刻書者改變了書名,割裂先唐部分與唐代部分,分爲兩書出版,並將較爲寬泛的“古詩”一詞用在書名中,從而與同一編撰者所輯的唐詩總集區分開來。

由此可見,書名的變更有時或許並非是編者的意圖,在商業印書繁盛的情況下,也許更多是印書者的選擇。他們在書名上做如此選擇,大概是爲了與市場上流通較廣、數量更多的唐詩總集區分開來,進而標榜自己這部總集的獨到之處。無論是讀者還是印刷者,他們在書名上的選擇進而影響了後續同類總集的命名。略觀萬曆之後的書名變化,自明崇禎之後貫於清代,基本上,編者本人也已以“古詩”爲自己所撰的先唐詩總集命名了。

這類總集的編纂出版是與明代復古運動處於平行並互相影響的狀態。前人的論著往往認爲在復古思潮的影響下,古詩總集開始編纂出版^②,這是較爲可信的說法。然而同時,復古思潮與總集編纂本身都處於動態發展的歷史過程中的。就總集的編纂與文學批評領域的關係而言,或許在更多情況下,是雙向互動的,是互相影響的。在當時,編纂一部“古詩”類總集或許並不僅僅是在編者文學思想影響下驅動的行爲,還有其他可能的編纂動機。總集編就之後,進入市場流通,讀者閱讀之後,從而影響當世讀者,影響後繼文人,從而間接導致了新的文學批評思想潮流的產生。

五、從序言推斷編纂與出版的動機

(一) 從序言看編纂出版動機

作爲另外一種副文本(paratext)要素,研究總集時,序言幾乎是必然會

^① 此處考證參楊焄:《明人編選漢魏六朝詩歌總集研究》,第140—141頁。

^② 如吉川幸次郎即認爲復古運動思潮的影響下,《古詩紀》得以出現,見〔日〕吉川幸次郎著,李慶等譯:《宋元明詩概說》(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282頁。

觸及的對象。這裏，筆者擬選取幾部知名總集，細讀其中序言，分析可能的編纂與出版動機。這裏所說的“序言”是廣義上的“序言”，包括詩集開端的序，也包括詩集後序。一部總集可能有一篇或幾篇序言，有時在前有時在後。前人已然指出中國文學總集常常是用以展開文學批評的工具，而海外漢學家對明清總集的研究也指出，明清總集的編纂出版動機較雜，明清時人並非僅以選目的美學價值為編纂取向，也會有教育因素、商業因素等考量^①。按照上文對書名的討論，也許當時人在編書時也有力求保存文獻這樣的想法。而就總集而言，序言的撰寫人有編者，也有出版者，也有當時名人。出版者的序言無疑表達了出版動機，編者序言表達了編纂動機，然而或參與或不參與成書過程的名人所作序言背後的動機則顯得比較模糊。

若略加以總結，可見明代總集序言中的內容無外乎：1) 批評時人文學風氣；2) 闡述書中體現的文學觀；3) 闡述本書編排與主旨；4) 敘述編纂過程；5) 力求保存文獻；6) 按照詩教思想，對教學需求、讀者需求的考慮；7) 點評前代總集。按照這一分類，對八部現可得見的、極為出名的明代總集序言加以細讀，這八部總集在當前研究明代古詩總集時均是需要討論的對象，它們要麼全選先唐古詩，要麼書中有一大部分選先唐古詩，按照總集的出版或編纂年月排列，將這些序言中主要論及的內容以表列出：

表五：八部明代詩體總集的序言內容分類

編纂或出版日期	書 名	編者序	出版者序	名人序
正德十二年(1517)刻本	漢魏詩集 ^②	2, 3, 4		1, 3
大約嘉靖年間	六朝聲偶集 ^③	2		1, 2

① Pauline Yu, “Canon Formations in Late Imperial China,” in *Culture and State in Chinese History: Conventions, Accommodations, and Critiques*, eds. Theodore Hutters, R. Bin Wong, and Pauline Yu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pp. 83–104.

② 《漢魏詩集》，南京圖書館藏 1517 年本，劉成德序，第 1a—5a 頁；何景明序，第 1a—3a 頁；蕭海《序漢魏詩集後》，第 1a—2b 頁；張文錦《漢魏詩敘》，第 1 頁。

③ 《六朝聲偶集》，《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 304 冊，第 1—85 頁。兩篇序言見於沈愷：《六朝聲偶集敘》，第 1—2 頁；徐獻忠：《六朝聲偶集後序》，第 84—85 頁。

續 表

編纂或出版日期	書 名	編者序	出版者序	名人序
嘉靖三十七年—— 隆慶元年間(1558— 1567)編成 ^①	古今詩刪 ^②			4, 2
嘉 靖 三 十 九 年 (1560)初刻	詩紀 ^③		2(甄敘);3,5,2 (張序)	
萬曆十一年(1583) 刻本	漢魏詩乘 ^④	7,3,1		
萬曆三十年(1602) 刻本	古詩類苑 ^⑤		2,6(俞序);2,3, 4(黃敘)	
萬 曆 三 十 一 年 (1603)刻本	詩所 ^⑥	3,7,6		
萬 曆 四 十 五 年 (1617)初刻	詩歸 ^⑦	7,2,3(鍾序); 2(譚序)		

(二) 動機之變化

按照上表,編者、出版者序言所反映的編纂與出版動機已經涵蓋了上文總結的七類內容的所有方面。僅就以上所見編者與出版者序言而言,隨著時代的變化,編纂出版動機的側重點似乎也有變化。在正德至嘉靖年間,“2) 闡述書中體現的文學觀”在上表出現更多,可見此時編者更側重文學觀點的表達,也就是說,對他們來說,先唐詩總集是用來進行文學批評的

① 《古今詩刪》的編纂與出版並非同一時期,李攀龍身後才得以出版,此處《古今詩刪》的編纂日期參楊焄《明人編選漢魏六朝詩歌總集研究》,第104頁。

② 《古今詩刪》,《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王世貞序。

③ 《古詩紀》嘉靖本(東京:汲古書院,2005年版)。序見第一卷,甄敬:《詩紀序》,第3—5頁;張四維:《古詩序》,第6—7頁。

④ 《漢魏詩乘》,《四庫全書存目叢書補編》第34冊,第522—679頁。序見梅鼎祚:《漢魏詩乘序》,第522—523頁。

⑤ 《古詩類苑》,《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320—321冊。序見俞顯卿:《古詩類苑序》,第1—4頁;黃體仁:《古詩類苑敘》,第4—7頁。

⑥ 《詩所》,《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325冊。序見臧懋循:《詩所序》,第1—3頁。

⑦ 《古詩歸》,《續修四庫全書》集部第1589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序見鍾惺:《詩歸序》,第351—352頁;譚元春:《詩歸序》,第352—354頁。

工具,而且從序言內容可見,編者們主要是爲了糾正時人對唐詩的重視,力求使讀者認識到先唐詩的重要性,才編輯這些總集的。

而從嘉靖三十九年(1560)《詩紀》初刻開始,嘉靖末期到萬曆後期所出的幾部古詩總集從內容看,都是編者以《詩紀》爲文獻基礎而編纂的,《古詩類苑》、《漢魏詩乘》都是如此,且《漢魏詩乘》、《詩所》的序言中均提及《詩紀》,也就是“點評前代總集”這一內容,並且談及自己所編總集與《詩紀》的不同。這一時段,也許可以從《詩紀》刻出之嘉靖三十九年(1560)開始,至萬曆四十年(1612)馮珣等人覆刻《詩紀》金陵本爲止,大概 50 餘年間,以《詩紀》爲首,漸漸構建了一個“古詩總集”撰選的系譜(genealogy),編者的側重點從以總集抒發文學觀點進行文學批評,轉移到了承襲《詩紀》傳統,與其進行對話,並且在此過程中,爲了創新,考慮到《詩紀》不足,在編纂動機上可能更多會考慮到當前市場與目標讀者的需求,比如《古詩類苑》便是分類編排詩篇材料,頗似類書。

而萬曆四十年以後,所出《詩歸》的序言內容則似乎又有所不同。萬曆四十二年(1614)鍾惺開始纂《詩歸》,萬曆四十五年(1617)《詩歸》印出^①,鍾惺等人作爲編者,在前面 50 年所出的文獻材料已然大爲充盈的基礎上,回到了以總集開展文學批評的動機,編纂總集雖也考慮到目標讀者的需求,然而很大程度上其實是爲了宣傳自己的文學觀點,後續崇禎朝新出的《古詩解》與《古詩鏡》都多以表達文學觀點爲主要內容,這幾部古詩總集的明顯共通之處便是:總集中出現了大量體現個人文學觀點的評點。

若結合評點內容的變化對總集的編纂加以考慮:在第一個階段,也就是《漢魏詩集》出現的時代,編者主要是通過篇章與選目的選擇與編排表達文學觀點,即先唐詩之重要。雖然書中也常常有一些評點類句子,然多起解釋詩意、背景的作用;第二個階段乃是“古詩總集”系譜的形成,這一時段中,面對不同讀者的需求,產生了多樣化編排的書籍,因而此時的總集編纂出版與文學批評聯繫不強,反而可認爲是爲了適應當時商業出版興起所帶來的讀者閱讀需要,而出現的必然商業消費產品。雖然像《詩紀》也都有評點,但也多是解釋背景一類的簡短句子,個人文學觀點的表達並不強烈;而

① 關於《詩歸》的纂修與刊刻,可參鄒國平:《詩歸成書考》,載於《中西學術》第一輯(上海:學林出版社,1995 年版),第 93—105 頁;又可見陳國球:《明代復古派唐詩論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 年版),第 273—284 頁。

第三個階段的主要特點則是,在文獻材料極度豐富的時候,批評家重視評點,加入大量具有個人特色的點評,以“點評類總集”作為自己抒發文學觀點的工具。因此,綜上,或許可按照序言中所見編者、出版者的編纂出版動機,將明代“古詩”總集的編纂、出版動機的變遷總結為:1) 1517—1560:為了文學批評的需要;2) 1560—1613:“古詩總集”譜系的形成;3) 1614—1644:文學批評目的的回歸。

從上表還可見到,和編者不同,或參與或不參與出版的名人可以算是第一批讀者,他們的序言往往會偏離編者或出版者所提到的內容,借該書來抒發表達個人的意圖,如上所示,《漢魏詩集》中名人序是何景明所寫,何景明參與了此書的校對,且在序言中大為讚賞劉成德對漢魏詩的關注。編者劉成德的序並無批評當時文學風氣,然而何景明則在序中以此書所選的漢魏詩批評了當時風氣,認為時人仍然沒有對漢魏詩加以足夠重視^①。作為整體的書籍,編者、名人序中的意思不一,因此對書籍賦予的涵義也並不一樣。不過,各種不同的意義都被打包入(packaging)一部詩集,因此,無論是誰,只要為這類書作序,其實都參與到這部書籍意義的生成中,進而影響了後世人的閱讀以及對這部書的接受。

六、從明清書目看可能的接受 ——價格、流通、閱讀方式

(一) 出版成本與價格

明清出版史的研究中,對明代書籍的價格時有討論,日本學者大木康教授與美國學者周啓榮教授都曾談及這一點,大木康認為晚明時期,書籍的價格應該非常便宜,不過他又認為當時書價是按照質量或內容而有差別,有高有低,比如小說在當時,於下層人士來說就是高價文藝消費品^②,周啓榮教授2004年的專著《早期現代中國的印刷、文化、權力》(*Publishing, Culture, and Power in Early Modern China*)第一章則對晚明書籍價格加以仔

① 《漢魏詩集》,南京圖書館藏1517年本,何景明序,第1a—3a頁。

② 大木康:《明末江南的出版文化》(東京:研文出版社,2004年版),第121—128頁;中譯本參大木康著,周保雄譯:《明末江南的出版文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2014年版),第62—66頁。

細考察^①，他認為，談論書是貴還是便宜，其實說的是相對價格（relative price），他比較了當時的物價情況、各個階層人士的收入情況，書籍出版的成本，進而認為大部分書籍在當時應是各個階層的人都買得起的，同時，也有那種“定位為高端讀者的多部頭書（multi-volume books targeted at high-end readers）”^②的存在，並且認為“明末清初大量的書籍市場售價低於1兩銀”^③。

而晚明文學總集的價格是怎樣的呢？現將周啓榮教授書中所引用的^④現存三部有明代書價記載的書目《汲古閣珍藏秘本書目》、《玉華堂日記》所記載的潘允端所購書、沈津《明代坊刻圖書之流通與價格》中所列總集拈出，列表總結如下：

表六：晚明文學總集的價格

小字元板	太平樂府 4 本	3 兩 2 錢
元 板	左克明樂府 6 本	3 兩
元 板	唐詩鼓吹 4 本	2 兩
	中州樂府 1 本	3 兩
宋 板	四靈詩 3 冊	6 兩
明 本	宋詞一百家(40 家手抄、60 家印刷)	100 兩
	十大家文	0.25 兩
	文選一部	35 兩
	漢魏六朝二十一名家集 123 卷	3 兩 ^⑤
	新刻李袁二先生精選唐詩訓解 7 卷 4 冊	1 兩

① Kai-wing Chow, “Chapter 1 Cost of Production and Book Prices,” in *Publishing, Culture, and Power in Early Modern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pp. 20–56; 此章中譯參見周啓榮：《明清印刷書籍成本、價格及其商品價值的研究》，載於《浙江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第40卷第1期（2010年1月），第5—17頁。

② Kai-wing Chow, *Publishing, Culture, and Power in Early Modern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47.

③ 周啓榮：《明清印刷書籍成本、價格及其商品價值的研究》，載於《浙江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第40卷第1期（2010年1月），第13頁。

④ 按照周啓榮教授書後附錄1—3信息列出，三個附錄分別是《汲古閣珍藏秘本書目》、《玉華堂日記》潘允端所購書、沈津《明代坊刻圖書之流通與價格》。參見 Kai-wing Chow, *Publishing, Culture, and Power in Early Modern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pp. 255–261.

⑤ 此欄與下欄所列的兩部書出自沈津文章，不過這裏的價格不知是何地何時出售書籍的價格，也有可能是清初價格。雖然如此，仍然對當前研究有參考意義。

從此表可見,似乎晚明時候,文學總集的價格高低相差極大,最高能至100兩,最低不過0.25兩。按照以上學者對當時物價的分析,0.2兩可以買到一把折扇,0.4兩可以買一把椅子,3兩在當時可以買一副棺材,40兩可以買一匹馬^①,1兩在中明到晚明時期不算便宜但是也並不是特別貴,1兩的書也是“經濟文化較發達地區的一般平民百姓都有能力購買的文化用品”^②。上表的條目中,可見“新刻李袁二先生精選唐詩訓解7卷4冊”是1兩,不算便宜也不算貴;而汲古閣珍藏秘本所錄宋板四靈詩則是每冊2兩,就當時的收入水平而言,算是價格貴的書。明本漢魏六朝二十一名家集123卷總共3兩,按照當時的收入水平來說,也算是貴的書了。似乎可以推得,當時文學總集(包括古詩總集)的價格可能並不像針對科舉考生的考試用書那麼便宜,也可能並不屬於1兩以下那些便宜的書籍。

畢竟材料過少,目前尚且無法得出確定的結論。表六的總集僅有《文選》與《漢魏六朝二十一名家集》兩種算是當時的“古詩”總集,那麼如何可以推斷當時古詩總集的出版價格呢?也許,我們可以通過討論這類書的刻印成本來看價格。書籍的印刷成本往往與書籍的裝幀、紙質等密切相關^③,如上所論,晚明市場上常有針對不同層次讀者的書籍出現,由於目前資料所限,也許可以通過看書籍的出版資金來源來推知書籍的刻印成本。

根據目前所見材料,繼續以表五中的八部總集為例,似乎除了《詩所》以及《詩歸》,其他總集的成功刊行都需要有資助人。根據總集的序言以及前人考證,可見:《漢魏詩集》十四卷為劉成德編成,然在何景明之兄的推薦下,由曾任安慶知府的張文錦“捐俸”資助方纔出版;《六朝聲偶集》七卷則是長水書院刻成;馮惟訥《詩紀》共一百五十六卷,實際上在1560年全部刊刻之前的十四年內陸續抽印刊刻部分章節,而最後全部付印是由當時陝西監察御史甄敬資助刻於陝西行臺,而後萬曆年間書板被帶至江南重印;《古今詩刪》在李攀龍生前未能刊刻,按照王世貞序,身後由新都汪時元附梓,按照署名,《古今詩刪》也有後七子之一的徐中行所訂,而汪時元為徐中行女婿;梅鼎祚的《漢魏詩乘》是由當時當地知府史起欽提供資金與人力資

① Kai-wing Chow, *Publishing, Culture, and Power in Early Modern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pp. 262–263.

② 對明代物價的具體分析參見 *Publishing, Culture, and Power in Early Modern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pp. 262–263.

③ 感謝《嶺南學報》匿名審稿人的建議。

助所刻；《古詩類苑》的序中就提及了編纂者張之象當時家貧無法刊行，後來由其友人校對付梓的編纂過程^①。由此可見，這些總集纂修完成後並沒馬上刊刻，而是在資助下刊行，很有可能暗示了出版成本較高，若此猜想成立，那麼這些書在市場定價上也許應該並不便宜。然而，在商業出版漸隆的晚明時期，《詩所》與《詩歸》似乎並不需要資助人就得以出版了。《詩所》編者臧懋循本人便是出版家，參與商業出版，《詩歸》則一出便迅速流行，成為暢銷書，並且迅速得以多次重印，這應該和鍾惺本人與商業出版活動的密切聯繫有關。雖然難有證據得知這些書的價格，然而仍可推知，在晚明商業印書興起的情況下，這兩部書的相對價格或許並非很高。

除了出版資金來源以外，我們或許還可以書籍本身的物理特質來推測書籍的價格，也就是說，也許我們可以看看這些書籍是否卷帙浩繁。若參考藏書目錄所記載的這些書籍的卷數，那麼可見若是按照上文給出的三時段劃分法，第一時段的書籍往往在卷數上較少，而第二時段的書籍，由於均是以一百多卷的《詩紀》為底本編輯而成，大多卷帙浩繁；第三時段的書籍，就卷數而言，似乎介於前兩個時段所出書的卷數之間。

也許我們還可以從“冊”或“本”的概念入手，對書籍價格加以探討。和“卷”相比，“冊”或“本”在印本時代，是文本的物理載體，若是印出的冊或本的數目多，用紙成本應會變高。明清書目大部分都僅記載卷數，不過也有一些書目列出了書的冊數。查考筆者所攢的數據，共 26 部“古詩”總集在明代私家藏書目錄中有冊數記載。冊數排在前五位的為：《詩紀》156 卷，有 40 冊；《古詩類苑》130 卷，有 32 冊；《詩雋類函》150 卷，有 30 冊；《古今詩刪》34 卷，有 20 冊；《詩所》56 卷，有 20 冊與 12 冊兩種；《詩歸》51 卷，有 14 冊。以年代論，嘉靖晚期與萬曆年間的古詩總集冊數明顯比嘉靖晚期之前多很多，最多達到 40 冊，而萬曆晚期的《詩歸》則為 14 冊，《詩所》有 20 冊與 12 冊兩種，最多似乎也就是 20 冊左右。因此，仍然按照上文討論編纂動機時給出的三時段劃分法，可將明代先唐詩類總集的冊數按照時間順序分為 1) 1—10 冊，2) 21—40 冊，3) 10—20 冊。

理想狀態下，在物價永恒不變的情況下，冊數變多則意味出版成本變

^① 此處對各書出版過程的描繪總結於目前對古詩選本的研究，對各書出版過程的考證，詳參景獻力：《明清古詩選本個案研究》，福建師範大學博士論文，2005 年；楊焄：《明人編選漢魏六朝詩歌總集研究》。

高。只是,這樣的想法只有在這些書所用的紙張種類一致,印刷時字體一致,每冊所裝訂的紙張數量一致,而且裝幀書籍時每葉內也並無襯紙的情況下才能成立^①。雖然如此,若同時結合三個可能決定書價的因素(出版資金來源、卷數信息、冊數信息),我們也許仍然可以推測出每部書籍相對於其他同類書籍的貴賤程度。

若此想法成立,可對總集的相對貴賤程度加以小結。當然,需要注意的是,這裏的總結僅僅只是筆者根據出版資金來源、卷數及冊數信息這三個與書籍價格有關的參數所作出的猜測與估算,由於材料較少,而且不同地域的書價或許也不太一樣,這裏的推測只能權作參考。按照上文的三時段劃分法,可將相對應時段的書價總結如下:1) 1—10 冊時段,此時先唐詩類總集的出版成本應該大多較高,如《漢魏詩集》共 14 卷,在藏書目中均被記載為 4 冊,其出版卻仍然需要外界資助,所以似乎當時出版成本較高,這樣看來明代中期書籍價格可能也不低。2) 這一時段乃嘉靖晚期到萬曆“古詩總集”成立的這段時期,冊數上大概屬於 21—40 冊區間,這類書籍多非商業刊行,也是多為官方資助,出版成本與價格大約都較高,目標讀者估計多是有一定修養的文人階層,並非是低收入的底層人士。3) 商業印書繁盛的時期,此時大部分書籍多是 10—20 冊,由於《詩所》、《詩歸》編纂者本人也參與商業印刷或與商業印書者有密切聯繫,商業印刷的介入使得圖書得以迅速刊行,和之前的那些動輒 20 冊的總集相比,書籍的價格應更為人接受。查檢《中國古籍總目》,表七中 123 卷的《漢魏六朝二十一名家集》為萬曆、天啓間汪士賢編,新安汪氏刻本^②,售價 3 兩,而《詩所》、《詩歸》在卷數上比《漢魏六朝二十一名家集》少多了,冊數上看《詩所》有 20 冊、12 冊兩種刊本出現於藏書目錄中,而《詩歸》在明人藏書目錄中均是 14 冊。因此,對照汪書的價格,這兩部書的價格估計極有可能是 1 兩以下或 1 兩多一些,應是文人階層可買得起的,這也許可以從價格角度解釋,和其他那些多於 20 冊的古詩總集相比,為何《詩歸》在晚明如此流行。

(二) 可能流通、閱讀方式

由於書籍的流通方式多種多樣,這裏也只能根據一些現有證據提出猜

^① 感謝匿名審稿人對這一問題的建議。

^② 《中國古籍總目》,集部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北京:中華書局,2012 年版),第 2779 頁。

測，明末《詩歸》大行天下，足見其流通之盛。那麼其他古詩總集呢？從藏書目錄看，《詩紀》及馮惟訥在編成《詩紀》之前所分卷抽印的《漢魏詩紀》出現頻率極高，而《六朝詩集》、《六朝聲偶集》出現頻率也極高，楊慎的《五言律祖》、《選詩外編》等書出現頻率也很高。

不過，藏書家目錄中出現頻率高並不代表書籍在當時的流行，可表示當時這些書較為通行，但也可能表示這些書在當時較難得到，還需要參考翻刻次數。以翻刻次數看^①，楊慎的書目翻刻較多，版本也很多。同理，《詩紀》、《詩歸》的翻刻都較多。因此，若是翻刻次數與藏書家書目頻率都多，那麼可以說這些書在當時流傳甚多，較為流行。《詩紀》、《詩歸》、楊慎的《五言律祖》及《選詩外編》應該都是如此。但是相對來說，《六朝詩集》、《六朝聲偶集》翻刻次數較少，而在藏書家目錄中上榜頻率很高，那麼則應該意味這兩部書當時較難得到，是藏書家追逐的對象。

就閱讀方式而言，讀者多以批點評注為主，而且對這類書的翻讀與評注往往會催生讀者進而編纂一部新的同類總集。如趙定宇曾批點元劉履的《選詩補注》，其子趙琦美在家藏《脈望館書目》中將此書記為“老爺批點”一條^②，證明了當時文人對古詩總集的批點式閱讀方式。又如臧懋循《古詩所》在序中明確指出纂修動機是不滿《詩紀》過於繁雜^③。同樣，鍾惺與譚元春編選《詩歸》時反覆斟酌，對當時已有材料加以閱讀，其閱讀過程也是總集纂成的過程^④，這樣一來，就形成了環狀的生產、消費系統，這一環狀系統在清代繼續存在，明清文人從而創造出了“古詩”總集的生產消費高峰。

七、小結：宏觀研究的得與失

綜上所述，本文首先對先唐詩文集在明代的編纂出版進行量化分析，得出結論，認為明代是先唐詩文集編纂刻印的高峰；隨後以不同的副文本（paratext）要素為討論中心，得出以下三點結論：

① 翻刻次數參《中國古籍總目》對各書版本的羅列。

② 趙琦美撰：《脈望館書目》，收入《宋元明清書目題跋叢刊》第4冊，第970頁。

③ 臧懋循：《詩所序》，《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325冊，第1—3頁。

④ 見陳國球：《明代復古派唐詩論研究》，第273—277頁。

第一,從書名可見,在明代,就先唐詩類總集編纂出版的歷史趨勢而言,由為前代補遺的傾向,變為力圖編纂求全式、總括性的先唐詩類總集。不僅如此,書名從含有具體朝代指稱的語詞,轉變為以“古詩”泛指“唐以前”。這樣的命名方式,影響並決定了明代之後編纂類似總集時的書名選擇。

第二,在編纂動機方面,從序言可見,編者的編纂動機側重點有一變化:正德至嘉靖中期,以總集批評當下文學流行觀點,表達文學觀點,或是為《文選》等經典補遺;從嘉靖後期到萬曆晚期,則是以《詩紀》為開端建構了“古詩總集”譜系,其間幾部書的編纂動機多受《詩紀》影響,同時又考慮當時讀者的需要,為與《詩紀》區別,在形式上力求變化,這一時段見證了“古詩總集”譜系的形成,從而使得文獻材料變得極度豐富。隨後的第三個時段,自鍾惺《詩歸》始,似乎編纂側重點又回到以古詩總集表達文學觀點,主要特徵體現為,這類總集中大量具有個人色彩的評點之出現。

第三,在出版與閱讀方面,從藏書目可以推知萬曆中期及以前,這類書很多卷帙浩繁,出版多有贊助人,出版成本似乎並不便宜,目標讀者應多是文人社群,而且讀者對這類書的閱讀往往會催生新的同類書籍的生產,從而形成了環狀的生產、消費系統,進而創造出了明清“古詩”總集的編纂高峰。

綜上所述,按照各種現有材料所提供的信息來看,我們可以將明代“古詩”總集的出版分為三個階段:1) 1517—1560:此時的總集多是為了補遺《文選》與《玉臺新詠》而出版的,或是為了批評當時尊唐風氣而編纂的,冊數上與選目上體現個人文學觀,不求全而求精,冊數不多,價格上或許不會特別貴;2) 1560—1613:“古詩總集”譜系的形成,此段以《詩紀》為發端,選目上多求全,卷數冊數都變多,書名上“古詩”得以廣泛應用,從而常常以“古詩總集”代指“先唐詩總集”,出版成本高,價格大概應較貴;3) 1614—1644:文學批評目的的回歸,這時應以《詩歸》為代表,特徵上表現為書中加入較多帶有濃厚個人文學觀色彩的點評,而此時冊數變少,加上商業出版的介入,和上一類書籍相比,這類圖書或許更為流行。

如本文開篇所說,前人的考證研究為筆者的分析提供了方便與基礎,也使得宏觀研究成為可能,本文的宏觀研究所採用的方法有量化分析、文本細讀等。宏觀研究使得歷史維度上討論“古詩”總集成為可能,也有助於釐清“古詩”總集是如何產生發展的,不過卻難以對各書內部的選目、評點

加以細緻觀察。以本文開篇所總結的三個面向來看,本文的宏觀研究方法主要涉及第三類——文本或書籍的社會學面向,也間及文獻面向,可能並未太多涉及文學批評方面。在未來研究中,筆者將對此加以補充,在宏觀研究的基礎上,對總集與文學批評的關係加以進一步深入討論。

(作者單位:美國伊利諾伊大學香檳分校)